



曹辛華 鍾振振 主編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 ⑫

汪東年譜

薛玉坤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曹辛華 鍾振振 主編

民國詩詞學文獻珍本整理與研究 ⑫

汪東年譜

薛玉坤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东年谱/薛玉坤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11

(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曹辛华,钟振
振主编.词学研究卷)

ISBN 978-7-5559-0000-9

I.①汪… II.①薛… III.①汪东(1890~1963)-
年谱 IV.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8993 号

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吴虞诗词研究与整理

本书为南京师范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与中华诗词研究院合作项
目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18)相关成果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1 000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曹辛华 钟振振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蔡世平	曹连观	曹书杰	曹辛华	陈国安	陈 杰	陈书录	程 杰
程郁缀	崔向东	党银平	高 峰	龚联寿	胡迎建	黄坤尧	黄 霖
李保民	李 超	林玫仪	林 立	林香伶	刘梦芙	刘瑞弘	刘 涛
刘 蔚	刘岳磊	陆 林	骆冬青	罗剑波	马大勇	马卫中	马亚中
莫真宝	南江涛	潘百齐	裴 喆	彭国忠	彭玉平	施议对	孙克强
谭桂林	谭新红	王国钦	王 睿	王 青	王伟勇	王秀臣	王卓华
徐雁平	薛玉坤	俞国林	张廷银	张幼良	赵维江	钟振振	周绚隆
朱德慈	朱惠国	朱丽霞	朱晓进				

各分卷主编

一、诗学研究卷	王秀臣	王卓华	主编
二、词学研究卷	程郁缀	彭国忠	主编
三、词学整理与研究卷	高 峰		主编
四、诗学整理卷	程 杰		主编
五、诗词法整理卷	王 青		主编
六、诗选整理卷	党银平		主编
七、词选整理卷	刘 蔚	曹辛华	主编
八、民国人选民国词卷	俞国林	曹辛华	主编
九、词学家文集(一)卷	周绚隆	曹辛华	主编
十、词学家文集(二)卷	李 超	曹辛华	主编
十一、各体诗话整理卷	陆 林	裴 喆	主编

出版说明

一、“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是专门对民国诗词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学术丛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申报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二、本项目由钟振振教授、曹辛华教授担任主编，由国内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卷主编。

三、本项目由11卷64种组成。其具体的分卷名称是：诗学研究、词学研究、词学整理与研究、诗学整理、诗词法整理、诗选整理、词选整理、民国人选民国词、词学家文集（一）、词学家文集（二）、各体诗话整理等。

四、本项目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形式多样。作者类型分为原作者、整理者、著者、编者及校注者，因而其撰写和编辑体例无法统一。根据尽量一致的基本原则，每种图书各自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体例风格。

五、根据主编要求，本项目对文献整理类著作采取了繁体横排形式，对文献研究类专著采取了简体横排形式。为既能符合本项目“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际内容，也能充分体现出整个项目形式特色的一致性，在多方面征求意见的情况下，丛书封面文字全部采用了繁体形式。

六、本项目中相关文献整理类著作涉及的文献内容，基本保持原貌。有明显错讹谬误之处，由整理者在文中附“按语”说明。

七、本项目所列珍本范围，大多为民国时期出版或未出版的诗词类著作。研究著作，限定在以民国诗词学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学者著作。本项目的“文献整理”对象，由主编者根据所涉资料进行构想与规划。

八、由于民国诗词学文献浩瀚无边，本项目所出现的缺失与遗憾有待续编弥补。

总 序

曹辛华

时至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民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从发生至今已逾百年。当前,对民国时期诗词学史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也还未提上日程。我们所编纂的“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丛书,即专门对民国诗词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攻关课题,2011 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成功申报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主持人为钟振振教授及本人。本项目的实施与完成,是在钟振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本人负责策划设计、组织实施、文献搜求、整理与研究等工作。同时,我们邀请到国内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卷的主编,以保证其编纂质量。全书凡 11 卷 64 种,其具体分卷名称是:诗学研究、词学研究、词学整理与研究、诗学整理、诗词法整理、诗选整理、词选整理、民国人选民国词、词学家文集(一)、词学家文集(二)、各体诗话整理。在此付梓之际,有必要再申述一下本项目的出版意义、编纂意图以及相关问题。

本项目的初步完成,对民国学术史特别是民国诗词学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当前,已有一批与民国学术、历史、文化相关的大型丛书出现,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学案》《民国笔记概观》,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珍本丛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等,以及台湾地区所印行的《近代史料丛刊》、凤凰出版社正在编辑并即将出版的《近代稀见史料丛刊》等。特别要指出的是“民国籍粹丛书”的出版。2006 年,全国高校图工委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二十余所著名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图书为主要来源,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参考已有民国图书目录和民国人物辞典等工具书,对1949年以后至今从未再版过的民国图书,精选一万种,以保持原貌的方式影印。由于此丛书宗旨不在民国诗词学,故所收此方面的论著相当少,并且目的不在现代式的整理层面。这些有关民国史、民国文化的大型丛书的编纂与出版,一方面说明对民国诗词的全面整理势在必行,并为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文献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显示了一些研究路径,开拓了研究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还有不少可开拓而未能启动的课题有待我们展开。这些已有成果虽然与本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有关,但其涉及范围过大,所包含的诗词论著数量相对较少,且多系影印出版,缺乏研究与整理这一环节。相比较而言,本项目所包括的诗词选本、诗词史料、诗词学等内容却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目前台湾地区王伟勇所编纂的《民国诗集丛刊》(2009)、张寅彭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2006)以及南江涛主编的《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一辑》(2013)等已问世,但其立足点基本上在诗词文本自身,而非诗词学文献特别是学术文献,也并非全面对诗词学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

本项目的初步完成,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学术价值。此项目是民国时期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总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国诗词的研究具有直接意义,对于民国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铺垫意义,对于民国文化的研究具有辅助意义,对于中国诗词学的整体研究 also 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版有利于对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对民国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也有利于对民国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人们充分认识民国诗词学家及其成就;同时,对诗词学研究、诗词研究、诗词理论与批评研究以及民国诗词等旧体文学的研究与深化,都将有所助益。可以想见,本项目的完成以及续编的启动,将进一步推动民国时期学术、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入。

于此,还须再强调一下本项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方面,不少民国诗词学文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重刊,研究者不易全面获得,不利于民国诗词学术史研究的全面展开,而本项目的完成将引导人们重视此方面的研究,从而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许多诗词名家,同时也是当时的思想家或著名学者,他们的诗词作品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进步思想和革命求索内容。对该时期的各种诗词学文献进行必要的整理、研究,可为进一步梳理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提供更多文学、文化方面珍贵而可靠的历史依据。再一方面,民

国图书由于印刷方面的问题,或易损或已损。由于人们“贵古贱今”的心理,对民国文献的保存不够重视,故散佚甚多,不少品种已成孤本。诗词学图书亦然。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诗词学文献,尚处于稿本、抄本、油印本状态,或以连载形式湮没在各种报刊中。为抢救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本项目的实施与完成大有必要。

在本项目设计之初,我们将其内容定位于编纂出版以“民国时期诗词学珍本”为中心的整理与研究,即选取民国时期出现的诗词研究、诗词选、诗话、词话等著作中的珍本(珍贵本、稀见本、准孤本、稿本、抄本、油印本、评点本、报刊本等),先进行考据、提要、评识,再录入、校勘、整理。最初的框架设想是分为上下两编,持续不断滚动式推出。上编为诗学卷,包括民国时期旧体诗研究、旧体诗选、旧体诗话、旧体诗歌史料四种;下编为词学卷,包括民国时期词学研究、词选、词话、词学史料四种。但在实际研究、整理的过程中,为了细化与深化有关民国诗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们虽然仍采取诗学类、词学类之称,但其卷类的设立已比原来有所改观与加强。相比而言,当前所出版的11卷64种比原来的设计更加丰满、细致与可行。

在本项目11卷中,首两卷为当代研究民国的诗学专著、词学专著,目的是要引起学界对民国时期诗词学著作的注意与重视。接着两卷为有关民国时期的诗学著作整理卷、民国词学家及词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卷,主要对此时出现的民国学者所撰的诗词研究著作进行整理,部分涉及对民国时期诗词研究家或文人的研究。诗词法整理卷,为专门对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诗词创作方法著作的整理,目的是凸显民国时期旧体诗词创作方法的兴盛。而词选整理卷、诗选整理卷,是专门对民国时期出现的各代词选、诗选著作的整理,目的是显示民国时期的诗词选本之兴盛;词选部分专门列出民国人选民国词卷,主要以民国时期学者对民国词的选著为主,目的是为民国词的研究提供文献史料。词学家文集卷,则专门对民国时期诸如刘毓盘、蔡嵩云、陈思、叶恭绰、赵尊岳、唐圭璋、刘麟生、汪东等词学家的文集进行全面整理。

本项目中,还有各体诗话整理卷,于此值得专门谈谈编撰缘由。各体诗话整理卷中,列有南社诗话相关内容,为当初我们所设想的“全民国诗话”之一部分。因其篇幅太大,遂仅以南社诗话为主编入。然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南社诗话全编”的篇幅、容量也相当惊人,非本次国家所资助的出版基金经费能完成,

所以权选是辑于此。“全民国诗话”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另列为重点项目,将单独出版。按原先申报计划与设计,当有“全民国词话”一项,由于此项后来被凤凰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项目不日出版,只好阙如。其中的《全民国联话第一辑》,乃出于当前人们对对联这一文体的认识与研究不力之考虑而纳入。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发现民国时期联话著作容量也很大,故采取“第一辑”的方式编辑。《民国新诗话》,为其中异于其他以“旧体诗词”为主要内容之各卷。之所以“破例”列入此项目,目的是打破当前人们以新、旧论诗的观念,也以此吸引更多学人注目于民国诗词学乃至旧体文学研究领域并投入精力,从而启发更多的古代诗词研究学人摒弃新、旧隔阂,以打通、圆融的观念来研究诗词学。同样,《全民国曲话第一辑》的设计与编纂,一方面,是回归传统诗、词、曲、赋兼包的“大诗学”观念,打破文体区别研究的壁垒,以有利于中国“诗性”文学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由于民国时期出现的曲话数量众多、容量庞大,亦非本出版基金项目所能尽刊,先出版第一辑以示此领域尚待深入。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如部分著作存在版权问题。我们尽可能避免版权有争议的著作,有的实在无法避开就尽量与著者后人联系,以支付其后人相应底本费的方式解决。所幸的是,不少著者的后人都以先人著作能再见天光为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又譬如如何尽可能多地拥有“珍本”问题:对有些“珍本”,尽管知其藏所与归属,但由于种种阅览限制、奇货可居的心态与“文物”化等因素,迄今仍不能获得。又如收录原则问题:像在民国时期有重大政治问题但于诗词学方面有建树的作者,本着不以人废言的原则,对其著作虽有收录、整理与研究,但我们必一一说明其由。

整理与研究成员的选择问题,也是较费踌躇的事情。当前研究民国诗词学的专家学者,相对集中在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以中华诗词研究院为中心的学者群那里。与唐宋文学等相比,成熟的储备人才相对较缺,不少学人还处于边学习边研究的水准。因此,从事本项目中各项内容整理与研究的学人多以中青年为主,且以年轻的硕士、博士为主要成员。为克服此中学术质量问题,我们采取了“传、帮、带”的方式:一面大胆起用年轻学人,为民国学术研究准备“学术种子”;一面由学术有成的专家把关,以保证丛书的质量。当然,大凡开创必有不足与遗憾,相信能够获得各位方家的谅解。

总之,“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这一项目,是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并且具有开启多维、辐射全局意义的重大攻关工程。目前,本项目所收录的民国诗词学文献仅是冰山一角,尚有更多、更珍贵、更有价值的诗词学文献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掘、开拓、整理与研究。所幸的是,国务院参事室所隶中华诗词研究院已将研究重心侧重于现当代诗词的研究,并与我们所在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机构形成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以期共同开发、研究、促进与繁荣民国诗词学研究这一广袤领域。本项目在完成过程中,中华诗词研究院就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与关照。伴随着本项目的有序展开,本人还在杨海明、莫砺锋、钟振振等教授的指导下,成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本丛书中有不少内容即是与此重大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

民国诗词学的研究亟待加强与深入,大有可为,并不仅仅限于本项目的意旨与范围。如目前正在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词史”,以及正在整理出版的“全民国词(第一辑)”“全民国词话”“全民国诗话”等,也可视为与本丛书配套的从多角度整理与研究民国诗词学的学术课题。相信本丛书出版后,将会出现“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的续编、三编,或者民国其他旧体文学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论著。相信国家未来进行“民国史重大工程”时,也会加强、加大资助力度以开发民国各种文学、文化文献或史料,也会出现对其他旧体文学形式、学术批评等多方面的论著或丛书。相信民国学术史的“热潮”会越来越高涨。

凡例

一、本谱以谱主《梦秋词》、《寄庵随笔》、散见诗文、个人档案为基本材料，杂采同时往来师友诗文集，并相关期刊报纸记载为据。

二、本谱谱前述谱主家世渊源，谱后附录著述年表及相关传记评论材料，俾便全面了解谱主生平、学术与思想。

三、本谱纪时采用公历。月日间或于其后标注农历，以便与引文相参照。

四、本谱按年月日纪事。无日可考者系月，称月份或“是月”；无月可考者系年，称“是年”。各列于相应月、年之末。

五、本谱谱文之下，引述相关文献以明事迹所本。引文中如有歧义或需补充说明者，则加按语略为辨证。凡征引文献，均注明出处，以便稽核。

六、谱主交游人物，除众所周知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黄侃等，一般于初见时附以小传。

七、原文中缺字或漫漶不清处用□标示，明显误字则以方括号改正。

汪东：政治与学术间的徘徊（代序）

薛玉坤

一百余年前的中国学人，深处社会动荡与文化转型之中。他们中除少数横放杰出之士能够审时度势，引领一代风骚外，多数人往往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挣扎彷徨成为普遍的思想状态与情感状态，人生道路也由此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复杂态势。同时，因为社会的激烈动荡，职业身份的频繁变动也成为常态。比如与黄侃一起被称为“余杭二妙”的汪东，一生即常徘徊于学院内外，人生角色转换于官员、教授、学者、文人之间，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在词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获。

汪东，原名汪东宝，字旭初，号寄庵，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家族是出过三拔贡、四知府的姑苏望族，在近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常有这个家族成员身影的闪动。比如汪东祖父汪亮钧，由廪贡生授镇江府学训导，因协防太平军有功，赏五品顶戴；伯父汪凤池，为官清正，在山东道监察御史任上，曾上疏力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伯父汪凤藻，京师同文馆毕业，曾任驻俄使馆参赞及出使日本大臣。甲午战争期间，与日交涉，多能力驳日本之无理挑衅；其父汪凤瀛，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延聘入幕，深得信任。民国后，又为袁世凯召为总统府顾问。袁谋划称帝时，汪凤瀛撰《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持“七不可”之说，是当时反对帝制的名文；而长兄汪荣宝更是近现代外交界重要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史及法律。回国后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钦定宪法》的起草。民国后，又历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公使。家族成员的仕宦经历，显示这是一个传统但并不保守的家族。

1890年，汪东生于镇江祖父府学训导衙署内，自幼便由祖父亲自课读。虽

然祖父是位正统的士大夫文人,又担任府学训导一职,对汪东的教育也自然离不开儒家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的理想。但那时的中国,已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面对满清腐败,列强环伺,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鼓吹革命,并通过办报启发民智,影响深广。汪东晚年回忆当时所受鼓动称:“先是戊戌政变及庚子八国联军以后,一部分维新派人(当时把改良派和主张革命的统称为维新派)逐渐转为革命论者。那时的所谓革命,实质就是‘排满’。上海的《苏报》,日本出版的留学界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以及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等等,都代表了这派思想。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受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民报片段回忆》)思想界的暴风骤雨以及祖父的开明,使得“革命”理想在年少的汪东心田萌芽。

1903年,汪东进入马相伯创办的上海震旦学院,与于右任同学。虽在同学中最为年少,但汪东“革命”热情高涨。当时邹容因著《革命军》一书系狱,汪东曾投书《江苏》杂志,歌颂其人。次年,因病辍学,但不久便留学日本,先后进入东京陆军预科成城学校与早稻田大学,并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务与撰述。这一时期,与许多留日青年一样,汪东已由“革命”思想的鼓动对象逐渐变成了义无反顾的“革命”思想鼓吹者,撰写了大量革命宣传文字,如《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答新民难》《复仇论》《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革命今势论》等,并在与宣扬康、梁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的《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虽然年轻,但汪东已俨然成为同盟会重要鼓手。

1908年,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为借口,封禁《民报》社,大批同盟会成员纷纷潜回国内。当时同盟会内部发生叛徒告密事件,两江总督端方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所幸汪东乘船抵沪后,即返镇江探视祖父。当常镇道台刘燕孙遣人追至镇江时,汪东又恰好回苏扫墓,由此得免。但此番遭遇,让家人真切感受到革命所带来的危险,力劝汪东不可再回日本。此后几年,汪东往来于苏沪之间,对同盟会的活动稍有疏离,其革命热情亦不如《民报》时期那样意气风发。

辛亥江苏光复后，汪东为原江苏巡抚程德全聘为都督府沪苏办事处秘书。此时同盟会内部日趋涣散分裂，特别是在南北和议的问题上各种力量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孙中山先生由于担心南方革命力量与北方袁世凯的武装长期相持可能会引发列强干涉，加之对袁世凯尚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讨袁檄文》）所以并不反对南北和议。而在上海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等，在立宪派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人的拉拢之下，也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之章太炎此时在上海创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公开与同盟会决裂。如此种种，都对汪东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当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柳亚子（汪为柳亚子姨丈）在《天铎报》上撰文抨击和议主张时，汪曾致书规劝。当时的汪东，对革命形势及前途，应该说内心充满了苦闷与纠结。其在《和清真词序》一文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彷徨：“岁在壬子（1912年），侨居海堧，遭世艰屯，意思萧械，进无弭乱之方，退乏巢居之乐。”

1913年底，汪东离开上海，进入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府咨议、内务部金事、政事堂礼制馆嘉礼主任编纂等职。这种由思想鼓动向政治实务的转向，背后有着多种因素的纠葛。革命形势及个人思想、立场的变化或是根本的原因，而如果考虑到此时其父汪凤瀛已为袁世凯召为总统府顾问，而长兄汪荣宝又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姐夫陈衡恪（师曾）亦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及在日同盟会旧友刘师培为袁世凯器重、授参政院参政等因素，则我们应能体会到，政治的抉择，在思想与立场之外，家庭背景、师友关系从来就是不可轻忽的诱因。理解到这样的复杂性，则后来刘师培、杨度、严复等人组织筹安会，推动袁世凯复辟，各地纷纷出现请愿团，要求变更国体，而汪东亦列名江苏请愿团的举动，就显得不那么吊诡。

此后，汪东由京官转任地方，历任浙江象山、於潜、余杭等县知事，其人生似乎又回归到传统士大夫的“宦游”旧路。但这样的“宦游”，意义显然有所不同。正如汪东自言：“那时的所谓革命，实质就是‘排满’。”因此，当满清覆亡，革命的任务便由“推翻”转向“建设”——这是转型期一般革命者思想认识的自然走向。所以，从激进的“革命鼓动者”转向务实的“官员”，也就成为汪东诸人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人生并非逻辑演进这般简单。1923年，汪东还是放弃了自己官员的身份。这一年9月，学术刊物《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社长由章太炎先生担任，汪东为编辑。汤国梨女士晚年回忆称：“一九二七年以前，（汪东）赋闲在

沪。乃向太炎建议：用章太炎名义办一月刊，所有征稿、编辑、发行等工作，俱由汪东负责。所需经费，则用太炎名义卖字所得抵充。……决定后，汪即在外赁一间房屋，披上牌子如法炮制，定名《华国月刊》。”（《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汪东何以在走上仕途十年之后选择了“转身”？转身后又何以选择去创办一份学术刊物？或许，剖析《华国月刊发刊辞》能让我们明了汪东此番转向的心迹。《发刊辞》虽然署名章炳麟，但据章太炎晚年弟子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称，实为汪东代笔。文章开篇即云“晚近世乱已亟，而人心之俶诡，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指出社会、人心、学术之沦落。接着以晚周孟、荀、庄、墨等人的学术“润泽百世，传之无穷”为例，证明乱世之中“学术”的价值，又由此引出对当下“异说昌披”“斯文将坠”的担心。最后点出本刊欲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办刊宗旨。《发刊辞》所体现的，固然有传统文人“三不朽”的精神追求，也有晚清以来国粹派思潮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汪东对个体人生道路反思的结果。十年仕途生涯的历练，汪东或许曾经有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的“立功”追求，但辛亥以来，虽然表面上已经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可社会依旧是纲纪废弛，上下失序。如此情形下，“立功”既显得艰难，也无益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回归学术，既能“立言”以“不朽”，又能发扬国故，拯救人心，诚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汪东几乎承担了《华国月刊》的全部工作，因此，随着1925年冬汪东赴南京任江苏省长公署秘书，《华国月刊》也不得不在次年停刊。关于《华国月刊》的终结，汤国梨女士的回忆将其部分原因归结为章太炎与汪东师生之间政治立场的分歧及汪东的“避祸”心理，其《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称：“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上海，因太炎一贯反蒋，汪东已避不见面，《华国月刊》社办事处的房主，以这间屋中，积存大批《华国月刊》，汪既不去处理，便至我家要求，即日把大批存书运走，以免被累。”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上海要到1927年3月，此时《华国月刊》早已停刊，汪东也已不在上海。所谓“因太炎一贯反蒋，汪东已避不见面”，更像是带有个人情绪的主观臆测。汪东停办《华国月刊》而转任江苏省长公署秘书，更直接的因素来自当时刚刚出任江苏省长的陈陶遗。陈氏亦为章太炎弟子，与汪东又为同盟会会友、《民报》同事。1925年冬，军阀孙传芳割据苏、浙、皖、赣、闽，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为笼络人心，提出“苏人治苏”口号，陈陶遗由张一麐推荐，就任江苏省长，汪东即在此时赴任南京新职。而“苏人治

苏”的口号与此前章太炎极力宣扬的“联省自治”理念别无二致。因此,这一时期,汪东的政治立场起码在表面上与老师并无太大分歧。

只不过汪东的这次出仕,时间并不长。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势如破竹,陈陶遗在向孙传芳提议与北伐军联合未果的情形下愤然辞职,汪东也只得再次离开。这一次,他选择了进入大学任教,从政治再次回到学术。这一年6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等合组成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江苏大学,又改国立中央大学),汪东受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与吴梅、汪辟疆、王伯沆、胡小石等共事。次年2月,同门黄侃也应汪东之招,前来任教。此后几年,汪东安心中央大学教职,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凸显了自己作为章门弟子的学者身份。授课之余,又先后参加了黄侃组织的“上巳诗社”与林鹑翔、廖恩焘等人组织的“如社”。春秋佳日,众人登山浮水,临流漱石,或烹茗啜饮,或吟诗赋词,颇具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生活雅趣。但这样的文酒之会,显然已是残阳的余晖,难以再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生活形态。毕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国的建立已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传统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况且民生之多艰,国家危机之日重,也不允许传统文人再一味埋首故纸,沉迷雅集。

事实上,汪东身上那种传统文人的“兼济”之志同样根深蒂固,其内心始终未能忘怀政治。因此,当“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来,社会的中心问题已日益转变成“抗击外侮”的时候,汪东不顾吴梅、胡小石等友朋的劝告,又重新投身政治。1937年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汪东辞去中央大学教职,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秘书长。不久又西迁重庆,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副厅长。1938年,应早年震旦学院同学于右任之邀,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4年,又任国立礼乐馆馆长。其间,曾于1943年秋兼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战胜利东归后,又担任了国史馆修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抱着“国民党贪污卖国弄得太糟了,或许此善于彼”(张一柔《由徽商迁吴定居的苏州汪氏》)的心理,没有随国史馆南迁,留在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江苏省委员、苏州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主任委员。1963年,病逝于苏州。身后留下了《梦秋词》二十卷及《词学通论》《法言疏证别录》等著作。

相较于很早就完成由政治向学术转型的同门友黄侃,汪东一生始终徘徊于

政治与学术之间,其人生角色显得不如黄侃那么“纯粹”,学术成就亦不如黄侃那般精纯。但汪东代表着那个时代“一般”的大多数,其彷徨、纠结的心态,迂回、曲折的人生姿态,以及背后时代、家庭、师友等因素的错综纠缠,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更具普遍性,因而某种意义上也更能展现历史进程的真实。陈平原先生曾说,刘师培这个“个案”的意义,在于他的“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和陷阱”(《激烈的好处与坏处——关于刘师培的失节》),汪东亦复如此。